

# 曾经唱起那首歌

## ——胶片时代的红色电影传奇

■文/赵军

### 一,开弓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电影业走下坡的艰难时期,从1980年到1990年广东的年平均观众人次为13亿,到九十年代末,广东观众年平均人次已下降到2亿。整个九十年代直至2010年代漫长的二十年,便成为我们“坚守产业、改革奋起”的二十年!

1993年的春天,北京下起大雪,中影公司邀请全国省市公司的发行经理聚集北京,观看年度将要发行的一批影片。这些年能够到手发行的影片越来越少,整个九十年代广东发行的影片只有1658部,比八十年代少了218部。这是中国电影迎来改革前夕的“至暗时刻”。

这个多雪的春天,能够看到几部好的影片吗?长春电影制片厂这时出品的一部影片《蒋筑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部讲述中国光学专家蒋筑英为英国英年早逝的影片由王兴东编剧、宋江波执导、巍子 and 姜美娟主演。那一天室外下着漫天大雪,室内人们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是一部严肃的完全没有“商业元素”的主旋律电影。看片会完成后它的拷贝订数全国总共只有40余个。(当时放映设备都是胶片放映机,发行按单个拷贝数量作版权和拷贝费结算。)平均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一个多一点。

时任广东省电影公司宣传科副科长的我,回到广东马上找各场所合试放这部影片,理由是人们能够纵情地哭的电影其实就有共情,共情便是市场预期。

我的好朋友、业余影评员余自强告诉我认识广州《羊城晚报》记者龚丹枫,于是在给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代表放映的晚上,我邀请了龚丹枫一起参加看片。一阵泪光闪过之后,电影结束。龚丹枫当年还是很年轻的刚大学毕业走上社会的女生,拿着采访工具笔和纸就挨个开始采访。

翌日,《羊城晚报》头版登出了全国第一篇没有任何官方推荐背景、没有任何自带流量的一部国产电影映后采访报道:(广东观众含泪看“蒋筑英”)。全国第一篇啊!新闻不胫而走。

冥冥之中注定事情要被搞大,蒋筑英夫人此时恰恰在广州开会,她很希望看到此作者。龚丹枫问我吗?我说当然!我们俩在广州黄华路一栋招待所里见到了蒋筑英夫人路长琴(姜美娟扮演角色原型),感谢感慨之余,我们亲耳聆听了一位中国光学专家为祖国无私奉献劳碌成疾最后客死他乡的,并且是他的夫人直接讲述的真实经过。

第二天,《羊城晚报》又一次头版,专门报道了蒋筑英夫人接受采访、感谢广东观众的详细经过。《羊城晚报》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份量,而广东媒体则首先被激励起来,文化记者们(尚未有娱记之称)纷纷怪责我何以给了晚报专美。我一口气说,得罪得罪,姑料未及;请君看片,赚君泪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慰英灵,拜托媒体!

我们趁势在广东省电影公司放映室举行了《蒋筑英》全国第一场首映式暨新闻发布会。那年月一部电影的新闻发布会非常罕见,广东宣传口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到了。“长影厂洗印车间吗?请为广东追洗12个拷贝!”电话那头不敢相信,似乎是洗印车间的工人因为没事干,早不用上班了,必须从家里请人回来。

影片因为这一轮新闻宣传炸开了市场!电影院出现了争看这部影片的人潮,全省各处也开始纷纷抢要拷贝,广东《蒋筑英》最后发行拷贝达到14个。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第一部通过市场宣传成功赢得了观众的主旋律国产电影。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全行业,

那一年我35岁。

### 二,信仰

1993年推广《蒋筑英》时,中山大学教授李以庄对我说:“他们为国家命都舍得,我们做好这些影片推荐有什么不可以奉献!”1996年著名导演陈国星拍出了感人电影《孔繁森》,这部歌颂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电影能否上映成功,我问自己如何奉献。

我先到广东省委宣传部,请发红头文件动员党政领导机关企事业单位支持影片上映(只能说这是特定的时代环境产物)。宣传部的干部说组织党员看电影找组织部。我找到组织部,组织部的干部说,电影宣传工作当然是宣传部。两个部推起皮球不愿承办。

时间到了6月下旬,距离全国预定上映日期不到十天……这一天我找到省委办公厅,说,广东省电影公司要交给在家的领导们送电影《孔繁森》。

“新时期的焦裕禄”,广东省电影公司对之没有费用的要求也没有办事的要求,这是送上门来的好事。办公厅回复OK,OK,并且说分管组织的省委副书记要来看的,分管纪检的省委副书记也要看的。意思就是要重视,既是上门送电影,就要放好它。

那一天,我带着放映小分队送到了省委,架好放映机,确认两位书记即将入场——转身就悄悄引领身后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和南方日报等少数几个记者,在放映开始一团漆黑之际,潜入到了副书记们的周围——悄悄的进村,开枪的不要。”形成了新月形。

人们泪水纷飞,直到结束那首动听的插曲《吉祥》差点让我忘记了神圣的使命。灯亮了,人们鱼贯而退,让领导先走。我一个招呼,记者们蹭蹭一下子围拢上去,就把书记们的去路堵住了!书记部长们丝毫没有想到,不是省公司的放映员吗?我说书记们好,现在可以签记者们了。

两位重量级的书记颇感突兀。当然,见过场面的也没有理由害怕,倒是他们身边的部长、秘书之类随从不知所措。记者们问,书记记录,很快正常过来了。各种观感,各种赞扬。采访很精彩,事情很顺利,领导很满意。

我不失时机对分管组织的省委张副书记说,“七月党风教育月”就来了,《孔繁森》应该动员全省党员干部都来受教育啊!书记这才看到我站在边上,忙说对,是值得推荐的好片子。我说那就发文件吧!书记转身问,XX部长来了吗?哦,你在这呢,赶紧帮他们起草一份党员干部观看文件。

我迅速从上衣口袋掏出了一份早已拟好的文稿,对书记说:“书记,文件已代拟好了!在这,请书记修改。”我前一天早准备的妥妥当当,本就是设计好的流程。书记猛地瞅了瞅身边的人,学学人家这执行力!记者们都还围拢着,也是头一回看到两位省委书记在过道站着办公!

组织部长马上递上了签字笔,书记堪称“犀利姐”,改动了两个字——仅仅两个,对部长说,明天就发!一句话。那位部长直愣愣看着我,看着我,看着……貌似想起来,前几天他不是来过俺们组织部吗?我不知道部长是否开始怀疑人生。

二十一年前,中国电影有过这样一幕,一位电影发行公司的基层干部,为了一部优秀的中国电影,用他的计谋、胆量 and 果敢的行动,做了这样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红色电影《孔繁森》迅速在广东市场铺开。这件往事我曾经留下过一首小诗:悠悠庙堂走一场,不凭荒唐凭信仰。中国电影路漫漫,落幕时分月正凉。 (待续)

# 《我的姐姐》：“姐姐”文化的负累和解锁

■文/周夏

经历了2月春节档井喷式的观影热潮,3月份略有回落的电影市场,4月清明节档又掀起了一个观影小高潮,令人意外的是,新人导演的家庭伦理小片《我的姐姐》上映10天票房破6亿,与好莱坞视效大片《哥斯拉大战金刚》共同撑起了整个清明档期,成为继《你好,李焕英》之后又一匹閃耀的黑马。不得不说,“后疫情时代”的观众对情感的需求大大增强了,一味的视听轰炸对观众的吸引力在持续下降,涉及家庭困境和亲情伦理的现实题材影片反而得到了市场的肯定,从《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焕英》一直到《我的姐姐》,父子情、母女情、姐弟情……柔化了每个人的心灵。

所不同的是,虽然前两部也引发了或多或少的争议,但主要的矛盾点在于是否电影化,“小红花”和“李焕英”整体都在传统主流的观念框架之中,是一种和谐之音,观众的共情度还是普遍比较高的。《我的姐姐》则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和撕裂,作为问题电影,它抛出了一个令人纠结的焦点议题:24岁的姐姐有义务抚养6岁幼弟吗?尤其是开放性的结局:姐姐拉起弟弟跑出了领养家庭,相拥而泣。这一点引发了“姐姐”们的愤怒,尤其是90后、00后年轻女性的强烈不满。直言“我不喜欢这个结局”,认为主创前面所做的一切努力到最后一刻却崩塌了。这背后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新一代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都极速提高,是不能轻易被冒犯的。这点上从“唐探3”不尊重女性的表现被热议就已经感受到了,同时也反映了在二胎时代下冒出的社会新问题。观众明显划分为两个阵营,一方是姐姐立场,另一方则站在弟弟的立场上或者“人道主义”的家庭立场,许多父母观影后都被年幼懂事无私的弟弟感动地一塌糊涂,认为姐姐应该抚养弟弟。每个人代入的角色不

同,所产生的观点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你能深刻感受到社会转型期在代际、性别之间所产生的巨大震荡,以家庭利益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和以个体价值为中心的现代观念正进行着激烈的拉锯战,这种新旧观念的交锋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必定会发生,这部电影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它的意义也许正是把这个议题引领到公共舆论场。

谈谈自己的感受,作为生活中的姐姐,我与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它真正切中了姐姐们的生存痛点,没有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又怎能感同身受!令人赞赏的是,《我的姐姐》第一次让姐姐作为第一主体发声,揭露自己真实的想法,敢于说“不”进行反抗,而不是以往电影中司空见惯的被他者歌颂的奉献型“姐姐”、牺牲型“妈妈”,它把平日里长久被遮蔽被默认的女性隐痛和伤疤揭开给大家看,挑战并质疑了既有的顽固守旧的性别秩序和思维惯性,代表了新一代女性要求平权的勇敢态度。这一点比《你好,李焕英》进步,与《82年生的金智英》相似,无论是婚前以弟弟优先,还是婚后以丈夫为中心,女性都处在“第二性”的位置。这在《我的姐姐》中“姑姑”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她已经习惯于付出与牺牲,为弟弟放弃自己的事业,为家庭操劳一生,多少女性就这样过完了一生,甚至还成为男性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形成了“无我”、“无私”的集体无意识,这也是上一辈大多数女性的处境,孕妇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儿子,这种悲剧依然在循环上演。

你会联想到许多影视剧中的姐妹花,《女人的故事》中为了给哥哥换亲,被母亲强迫嫁给哑巴的金香,为了生儿子而离家逃难的大肚子女人;《七声》中供弟弟上大学底层打工妹阿霞;《过春天》中出国优先权被弟弟占有的Joe。《欢乐颂》中被家人

不断索取的樊胜美,《都挺好》中被母亲嫌弃的苏明玉,《安家》中被恶母不断压榨的房似锦,她们的母亲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女儿的资源不断移位给儿子,因为“儿子”直接决定了母亲在家庭中的位置,“女儿”早晚是别人家的,不属于原生家庭体系,姐姐的权益长期被漠视被剥夺,而为家庭的无止尽的付出则被视为理所当然。父权社会的指挥棒无时无刻不起作用,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这种同构性的性别秩序并没有太多变化,中国式家庭中的“姐姐”实质上很多是从属性的,工具化的,带有一定的悲剧意味,。“招婿”曾经是许多女孩的乳名,从一生下来,她就被家庭赋予了一种潜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姑姑所说的“长姐如母”实在是太沉重了,可事实上生活中的大部分女性都不是主动要当姐姐的,而是在父母的选择下被动地“不得不”当上了姐姐,这在1996年李玉执导的纪录片《姐姐》里表现得充分,明明是同时出生的双胞胎,母亲为了让女孩多照顾男孩,而让女孩做姐姐,男孩做弟弟。《唐山大地震》中张子枫饰演的姐姐因为妈妈一句“救弟弟”而成为心里一辈子的痛,这种两难选择对妈妈来说很残酷,但是重来一次的话,我敢说妈妈依然会选择“救弟弟”,因为这种性别排序的认知早已深入骨髓。

庆幸的是《我的姐姐》中的张子枫长大了,她终于喊出了心底压抑已久的那句话:“儿子有那么好吗?”这是一部明确带有女性意识进行创作的女性电影,为女性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发声,为姐姐们提供了一个情绪释放的出口。姑姑也在一次事件中反省,说了一句点睛的台词:“套娃也不是非要套进同一个套子里。”从强迫安然做姐姐到放手让安然做自己,寓意着姑

### 第一幕 噩梦,如此惊艳!

第一幕,说实在的,吓着我了。地铁里垂梦巨人迎面杀将过来的压迫感和致命重击,因为高超电影技术的加持,逼真感十足,这是一个值得激赞的电影化程度超高的开头,将生活对主人公的精神重压与暴力蹂躏,如此形象化具象化的呈现在观众眼前。

连场垂梦的节奏也很好,步步紧逼,让主人公也让观众毫无喘息之机,所谓被命运扼住了咽喉,在看《超级的我》第一幕的时候我真的体会到了。

接下来,男主角用一句“我在做梦”的咒语逆转颓势,居然从垂梦巨人手中抢下了一把宝剑,垂梦醒来,男主角的怀里居然就抱着这把宝剑。

哎哟!有点意思!  
我的胃口被高高吊起,翘首以待后面的好戏!

同,所产生的观点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你能深刻感受到社会转型期在代际、性别之间所产生的巨大震荡,以家庭利益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和以个体价值为中心的现代观念正进行着激烈的拉锯战,这种新旧观念的交锋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必定会发生,这部电影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它的意义也许正是把这个议题引领到公共舆论场。

谈谈自己的感受,作为生活中的姐姐,我与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它真正切中了姐姐们的生存痛点,没有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又怎能感同身受!令人赞赏的是,《我的姐姐》第一次让姐姐作为第一主体发声,揭露自己真实的想法,敢于说“不”进行反抗,而不是以往电影中司空见惯的被他者歌颂的奉献型“姐姐”、牺牲型“妈妈”,它把平日里长久被遮蔽被默认的女性隐痛和伤疤揭开给大家看,挑战并质疑了既有的顽固守旧的性别秩序和思维惯性,代表了新一代女性要求平权的勇敢态度。这一点比《你好,李焕英》进步,与《82年生的金智英》相似,无论是婚前以弟弟优先,还是婚后以丈夫为中心,女性都处在“第二性”的位置。这在《我的姐姐》中“姑姑”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她已经习惯于付出与牺牲,为弟弟放弃自己的事业,为家庭操劳一生,多少女性就这样过完了一生,甚至还成为男性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形成了“无我”、“无私”的集体无意识,这也是上一辈大多数女性的处境,孕妇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儿子,这种悲剧依然在循环上演。

你会联想到许多影视剧中的姐妹花,《女人的故事》中为了给哥哥换亲,被母亲强迫嫁给哑巴的金香,为了生儿子而离家逃难的大肚子女人;《七声》中供弟弟上大学底层打工妹阿霞;《过春天》中出国优先权被弟弟占有的Joe。《欢乐颂》中被家人

### 第二幕 眼看主题跑偏…

我满心期待着男主角跟自己的命运继续交手,却眼见故事一步步跑偏……  
他抢了垂梦巨人的剑,卖了!  
是的,他卖了钱,然后感觉很好!  
下一个梦里,他又抢了垂梦巨人的斧头,卖了更大一笔钱,感觉更好了!  
接下来,他反客为主,从一个编剧,改行成了抢匪,在梦境里抢钱、抢车、抢黄金,抢的风生水起,最终成为当今世上最有钱的人!

《超级的我》的第二幕中有许多特别令人迷醉的赤裸裸的展现金钱之美的段落,晃眼的金子,成箱的钞票,豪车、美女、极致奢靡、纸醉金迷。男主角的状态更说明了钱治百病,自从有钱了,腰也不酸了,背也不驼了,居然连剧本都写得好了。这种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倾慕、炫耀金钱之美的电影,我之前好像看过一部,走出影院查了下导演的履历,果不其然找到了《小时代》——《小时代》2和3的制片人,于是释然。

既然说到了《小时代》,熟悉的观众应该解除了360度展现土豪金的生活之外,《小时代》还有一大主题——高三到大一年级的男生女生的纯爱痴恋,这两大主题也就是《超级的我》第二幕的主题。

之前从精神分析学、荣格、易经那外借来的高级设定,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就连画面风格也变得不那么技术硬核了,而是台湾纯爱片的调调,加上主演王大陆特有的台湾口音,恍惚间,我仿佛在看《我的少女时代》。当然凭心而论,王大陆和宋佳的CP感,真如片中所说,是“小孩孩”和他永远也追不到的姐姐。

### 第三幕 反派——剧本“补锅王”?

我依然期待第三幕,之前挖的坑,怎么也得自己填上吧。  
这种剧情,观众们都能猜到,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拿了吃的了最终都要还回去。就看你怎么还法?  
第二幕忙于拜金,忙于追爱,在影片本该着力的“三重自我”这条线上,实在欠债太多,只花了一点点笔墨写到男主角层次突入梦境,愈战愈强,而梦中巨人的战力则日益衰弱,到最后一次,甚至直接瓦解碎裂成灰,至于为什么男主角每一次入梦都可以直入财富之地如银行、车库、珠宝行、宝藏山洞,是不是因为男主角的本我彻底放飞了对金钱的渴望,梦中巨人灰飞烟灭之时用两根手指在男主角胸前的一划,究竟是什么意图,这些第二幕按下不表的问题,我以为都会先抑后扬,在第三幕给出一个答案。

第三幕本来开了一个很好的头,男主角梦中被巨人砍伤的伤口,突然出现在现实中男主角的脸上!我被第二幕台式言情剧差劲拖垮的神经为之一振,新老老眼一起算,之前夺宝每一战的伤,一道一道全都出现在男主角的身上,然后呢,他还怎样一口一口被自己的欲望反噬?

凌厉的开局之后,第三幕再度跑偏。影片轻飘飘的绕过最关键的矛盾解决高潮,莫名其妙空降一个吴刚扮演的嗜血老大,真的是空降,这个角色

不断索取的樊胜美,《都挺好》中被母亲嫌弃的苏明玉,《安家》中被恶母不断压榨的房似锦,她们的母亲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女儿的资源不断移位给儿子,因为“儿子”直接决定了母亲在家庭中的位置,“女儿”早晚是别人家的,不属于原生家庭体系,姐姐的权益长期被漠视被剥夺,而为家庭的无止尽的付出则被视为理所当然。父权社会的指挥棒无时无刻不起作用,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这种同构性的性别秩序并没有太多变化,中国式家庭中的“姐姐”实质上很多是从属性的,工具化的,带有一定的悲剧意味,。“招婿”曾经是许多女孩的乳名,从一生下来,她就被家庭赋予了一种潜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姑姑所说的“长姐如母”实在是太沉重了,可事实上生活中的大部分女性都不是主动要当姐姐的,而是在父母的选择下被动地“不得不”当上了姐姐,这在1996年李玉执导的纪录片《姐姐》里表现得充分,明明是同时出生的双胞胎,母亲为了让女孩多照顾男孩,而让女孩做姐姐,男孩做弟弟。《唐山大地震》中张子枫饰演的姐姐因为妈妈一句“救弟弟”而成为心里一辈子的痛,这种两难选择对妈妈来说很残酷,但是重来一次的话,我敢说妈妈依然会选择“救弟弟”,因为这种性别排序的认知早已深入骨髓。

庆幸的是《我的姐姐》中的张子枫长大了,她终于喊出了心底压抑已久的那句话:“儿子有那么好吗?”这是一部明确带有女性意识进行创作的女性电影,为女性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发声,为姐姐们提供了一个情绪释放的出口。姑姑也在一次事件中反省,说了一句点睛的台词:“套娃也不是非要套进同一个套子里。”从强迫安然做姐姐到放手让安然做自己,寓意着姑

姑的觉醒。游晓颖编剧的另一部电影《相爱相亲》也安排了姥姥的觉醒,一辈子守空房的姥姥在最后终于选择放手“丈夫”,传统的家庭伦理在最后轰然倒塌。编剧很擅长把人物放在伦理困境中去编织故事,《我的姐姐》也不例外,独立自主的姐姐在最后一刻签字时的犹豫与其被解读为“姐道回潮”,不如说是由分到合再到分时的自然情感反应,它是姐弟相处数日后真情实感的流露,弟弟对姐姐爱的回馈显然是一种治愈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安然会放弃继续寻找合适的领养家庭。对于小男孩的塑造有些地方的确超越了年龄,有点刻意了,但却寄托了主创对新一代男性改变的召唤。就像张楚30年后重新演绎的片尾曲《姐姐》:“他们说姐姐就应该付出和忍耐,我不明白。哦,姐姐,你去飞啊,放开我的手,就不会累了。”我突然理解了片名为什么叫《我的姐姐》,而不是《姐姐》。它代表着新一代男性的改变、弟弟们的反醒。“新女性主义”要求建立男女平权的性别新秩序,绝不仅仅是女性自身的改变,其中也包括对男性的塑形。只有这样,两性关系才能真正走到健康的轨道上来。安然回望了过去,但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正像社会学家李银河所说的那样:“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一个现代化的男人人格平等的新秩序正在形成。”结局依然会选择“救弟弟”,因为这种性别排序的认知早已深入骨髓。

令人振奋的是,从滕丛丛的《送我上青云》、杨荔钠的《春潮》到殷若昕的《我的姐姐》,女编剧、女导演、女演员合力打造的女性电影部部都引发了热议,她们所创造的电影新景观,所表达的新意识,强烈冲击着我们的内心。女性电影新浪潮已然来临,势不可挡,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 《超级的我》：外表“高精尖”，内里“傻白甜”

■文/周丹

之前甚至都没出现过,完全就是一个替编剧本锅的江湖救急人士。如果一定要上演黑吃黑的戏码,用张颂文扮演的职业销售师反吃男主角从戏剧逻辑的角度都更站得住一些。作为一个纯粹的工具人,吴刚扮演的黑老大不仅毫无理由的抢走了男主角所有财富,还欲将他们斩尽杀绝。吴刚老师贡献了职业生涯中少有的油腻表演,再好的演员也无法拯救一个毫无逻辑合理性的角色。最终,被逼到绝路的男主角一点点异变成梦中巨人,全歼吴刚一伙。确定思病的男主角,对好友、恋人都惨死面前的结局很不满意,喊出“我在做梦”这个最强咒语,一切回到最初,黄粱一梦猛醒,他还是那枚穷挫男。

故事看起来算圆回来了,可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逻辑闭环上的裂口,吴刚这个角色,是个男须有强加进来的角色,他抢走了男主角的财物,就抢走了男主角的原罪吗,便可以代替男主角接受审判与惩罚吗?

一直到影片最后,我都期待着集编剧与导演一身的张群会给观众留一点呼应,解释其故事设定的相关高大上概念或高精尖技术的硬核时间,男主角异变成梦中巨人的场景,显然坐落了影片的重三重自我主题,丧行代表自我,夺宝成为巨富的成功男代表本我,而梦中巨人代表了超我,按电影里所言,本我可以去超我的世界里抢钱,而超我也可以到本我的世界里干掉贪婪的坏人,那么影片中超我、自我、本我的边界与梦想现实之间的边界又是什么关系?

我有太多的想知道的问题,然而影片一个答案都没给我。  
走出影院,仰天长叹,世界上最无奈误会,就是我想吃的主菜,只是卖家用来摆盘用的花样。

走出影院,仰天长叹,世界上最无奈的误会,就是我想吃的主菜,只是卖家用来摆盘用的花样。

走出影院,仰天长叹,世界上最无奈的误会,就是我想吃的主菜,只是卖家用来摆盘用的花样。